

包達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一冊

——史料與史學

正中書局印行

包遵彭
李定一 編纂
吳相湘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一冊

史料與史學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臺二版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一冊

史料與史學

全一冊 基本定價 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包李吳蔣

遵定相建

彭一湘白

發行所

正中

正中

書局

書局

發行所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海外總經理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內政部登記證 內警臺業字第一〇四號

(3901)

叙 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稿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纒難紬繹的原因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爲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蒐輯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贋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果，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爲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多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還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爲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共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廣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

面輯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種例證，更加強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為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作透澈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 例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導 論

在世界學術史上，中國的史學，是一枝獨秀特放異彩發達最早的。西漢中（西曆紀元前二世紀）司馬遷應用謹嚴方法傳信存疑分析整理各種史料而撰成的史記，就是世界第一部將「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觀念形之具體的最高典範，同時也是將「歷史」的範圍擴大成爲全體國民各種活動紀錄的空前創製。其後宋朝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且特附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示人以璞，更使後學得有規矩可循；至北宋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審，遂發展到令人驚異的地步——但不幸降及清末，中國史學不僅未能遠紹前規發揚光大，並且反被歐洲十八九世紀之交方始興起的史學研究迎頭趕上了。

就中國史學史說來：這真是二千餘年來未有的大變局。

首先體認到這一「大變局」的是清末維新運動主角梁啟超——清光緒二十八年西曆一九〇二年梁氏在日本特著「新史學」一文，鄭重提醒國人說：「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而我中國自兩司馬以下，史書雖繁多至汗牛充棟，惟其內容則陳陳相因，一邱之貉，祇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祇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

足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是「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因之，梁氏大聲疾呼：「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

應該指出的是：梁氏在正式高倡「史界革命」之前一年，即曾發表「中國史敍論」一文，自日文著作中間接採取西人著述世界史區分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之例，將中國史亦區分爲三時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爲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爲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曠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爲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

這是我國歷史時代區分的新見解。換句話說：這也是「中國近世史」一名辭與觀念的首創——這一年是清光緒二十七年即西曆一九〇一年，下距本「論叢」的出版恰爲五十五年。

就飲水室文集看來：梁氏在發表「中國史敍論」提出其新見解之前二年（光緒二十五年），曾於「東籬月旦」文中特別介紹日人田中萃一郎所著「東邦近世史」（原註：上海廣智書局近已譯）：

其書起自歐人之東來通商（第一章），以「滿洲之興起」、「俄國東方侵略之初期」、「中亞英俄衝突之初期」等實串敘述其間，而殿以「鴉片戰爭及洪楊之難」。梁氏品評其書「能發明東西民族權利消長之趨勢，蓋東洋史中最佳本也」——梁氏曾謂日人所著東洋史實即中國史之異名。然則早在梁氏提出其新見解之前，日本學人即已有「中國近世史」行世且有中譯本流傳於我國內了。

至於我國人用「中國近世史」或「近世中國史」名書梓行於世的，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梁啟超氏以「捫蝨談虎客」筆名刊行的「近世中國秘史」，要爲首開紀錄的第一部。其書內容是輯錄朱明北都覆亡後與滿清和戰事實以及李秀成供狀等史料八種。敘事時代斷自明清之際——值得注意的是：此其所謂「近世中國」斷自明清之際，顯與其前在「中國史敍論」中所區劃的近世史斷自「乾隆末年」大不相同。細按飲水室文集和梁氏在「中國史敍論」發表後之翌年（光緒二十八年）所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文中「近世之學術」節，即特別著明「起明亡以迄今日」，其斷代標準與「近世中國秘史」相同而有異乎舊說。由是可知：當梁氏首創「中國近世史」一名辭與觀念之初，其於劃分時代的標準即尙未能有定見。

抑不特此，甚至當梁氏晚年提出其對國史的最後見解時，於其舊說更多修正或予推翻——民國十六年（西曆一九二七年）梁氏在清華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時有云：

「歷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強的，一方面不當太呆板，以一姓興亡作根據，像從前一樣。換一方面，又不當太籠統，粗枝大葉，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世三個時期。比較妥當一點的：還是劃春秋爲一個時期，戰國爲一個時期，兩漢爲一個時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國兩晉南北朝爲一個時期，隋唐爲一個時期，宋遼金元明爲一個時期，清分爲兩個時期；這種分法全以社會變遷作標準。在一個時期中可以看出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改換的大勢。」

「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後，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不特是清代歷史的大變遷，並且是全部歷史的大變遷，我們儘可以把道（光）咸（豐）以前劃分爲一個時期，道咸以後另劃爲一個時期」。

這所謂「道咸而後」應即指鴉片戰爭言。換句話說就是以鴉片戰爭爲劃時代的標準大事件。此其持論，顯然與其舊說大相逕庭——自表面看來，似爲梁氏前後見解的矛盾。然一深刻觀察：則梁氏的最後見解正足以反映國史學研究之進步。

早在民國三年冬中華書局印行但燾氏主持編譯的「清朝全史」（日人稻葉君山著）編輯大意中即曾指出：「西力東漸，實始通商，乾隆以還，備極輭弱；鴉片一戰，情見勢絀，有清盛衰，此爲樞紐。原書記載茲事，詳盡無與倫匹，所引西籍……茲譯稍加理董，爲施斧藻，豁然易觀，庶符價

雅」。對於鴉片戰爭的重要性是如此地強調指陳，在當時我國史學界說來是對舊史實予以新意義新價值的空前舉動；而同書編輯大意又續指出：「清史取材，淵源東華（錄）：蔣（良騏）王（先謙）二家，要皆采自實錄；據著者稱今本實錄，乾隆以後，一經重修，頗有諱飾，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日本別有傳抄本三朝實錄，記載迥殊；清初之事，多所采輯；故是書之翔實，較諸吾國前此官本，實越其右」。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祿原著取材的淵博新穎——事實上原著引用參證的史料確有為國人前此所未見及的，因之，譯本刊行，一年之間即經三版，大有洛陽紙貴不脛而走之勢。當時國人「歷史知識饑渴」情況可以想見。從此以後，鴉片戰爭為劃時代大事件之見解，遂隨是書流傳而滲入我國知識份子腦海了。

平心說來：清朝全史原著者於史料的運用與考釋以及史實因果之分析說明，對我學術界實有其刺激作用，對於一般讀者的歷史知識也是有其影響的。尤其原著若干處所充滿政治意味的偏見，更為一值得注意的嚴重問題，不幸「官修清史汗青無日，即成亦決不足以鑒天下之望」。因此，首倡「史界革命」與「新史學」的梁啟超氏自慚「志不縛壹」、「又多所驚」、「荏苒鮮就」之餘，更要感慨「吾人之理想得有所麗以商榷於世者，何其寥寥也？豈非闡理則易為言，實事則難為力？」（清代通史序）。

但國內軍閥割據，內戰不已，有志之士很難獲得一比較安寧的環境以從事研究工作，實在是「新史學」理想未能見諸實行的一主要原因。因此，民國十三年夏，蕭一山氏編撰的「清代通史」上卷行世，就顯得異常地難能可貴了：一方面這部書是當時一位青年學者憑個人力量在極端動亂的環境下埋頭苦幹的成績，他方面這也是近四十年來國人有關清代史實著述中體系較完整體裁較新穎的首一紀錄；惜因南北對立，交通阻隔，其書印於北京，當時未能廣為流傳（民國十六年始由商務印書館發行）；而國人身處內亂外患煎迫的情況下，「歷史知識饑渴」情況更形嚴重，於是劉彥氏根據日人著作編譯之「中國近時外交史」、「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先後梓行應世。其後又有孟世傑氏之「中國最近世史」及陸光宇氏之「最近中國近世史」等書出版。時坊間印行的清代文學作品也多以「近代文學」或「近代詩選」名書。至是：所謂「近世」、「近時」、「近代」、「最近近世」等名辭的界說就相當紛雜了。

幸其時國人留學歐美者日多，對於歐陸史學已可直接迎頭採擷，不必再自日本轉販。而當時歐美史學界在便利分工合作研究之原則下區分益精細：例如近世史部門即有劃分為「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十七八世紀史」、「十九世紀史」、「現代史」等等段落的，其中又區分為政治經濟外交學術種種專史，並再析為若干專題。這種方式與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情形頗有相同之處，因之

，我國史學界就很自然地將它採取過來。上錄梁啟超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講義，可以說即是這一情勢的反映。而所謂「鴉片戰爭爲劃時代之大事件」的見解，既早經播傳，今梁氏又復強調其爲「全部歷史的大變遷」，再加以歐美「十九世紀史」等類書籍之流行，於是我國坊間也多以「中國近百年史」作書名了。其中最著名且影響並便利於後學的首推中華書局印行左舜生氏編輯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及續編共四冊）。

就今日所可得見的資料研究：羅家倫氏要爲近三十年來首倡有計劃地研究中國近代史之一人；民國十五年春，羅氏留學歐洲即曾擬具收輯史料以爲研究初步的計劃——據民國十五年九月八日羅氏致沈兼士氏手函（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民國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廣州出版）所稱其擬收史料種類及收輯方法如下：

- （一）可以設法購得的原本史料（如我此次所得的林文忠親筆所批檔案）。
- （二）不可購得而可照像或鈔寫的（如倫敦巴黎等大圖書館所藏之重要中國史料，如洪楊文件、景善日記等。中國方面材料如清宮所藏祕密文件，亦當速鈔速照，以免孤本喪失的危險）。
- （三）尚可得到的絕版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當年耶穌會士論中國的書信，講鴉片戰爭的書等，如不急買，將來更難買。

(四)隨時購買新出的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前德國庚子聯軍大將瓦德西所出回想錄等，爲研究庚子一役史事之決不可少的書籍。

(五)尙可得到，但是已絕版的中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鈔本附買）。

(六)隨時購買新出的中國文的史料。

羅氏以爲設能按此計劃進行，而每年有兩萬圓（當然不能充足，但可將就）可以分配，則十年以後必大有可觀。

其時，羅氏友人清華研究院教授陳寅恪氏曾據以向清華當局建議，並得趙元任氏贊助，擬即籌集款項委託羅氏就其(一)(二)(三)兩項着手在歐洲各地搜集。嗣因清華教務長更迭，北京附近戰事發生，無人負責而告停頓。雖使羅氏感慨「此等工作，日本人早經注意，而中國尙無萌蘖，可嘆！可嘆！」然羅氏並不氣餒：是年夏回國後即決心接受東南大學聘約，以便就近可以利用上海東方圖書館及亞洲文會所藏近代史料。旋復以上述計劃函達當時主持私立廈門大學文史研究的沈兼士氏，希望廈大能辦此事，「將來以此地（廈大）爲研究中國近代史之寶藏及策源地」。同時更提出具體可行事項：(一)請廈大立即撥款一萬元託請陳寅恪氏迅將故宮所藏軍機處檔案攝製副本。(二)如廈大予以經濟資助則渠本人亦擬於民國十六年初夏前赴北京專心研究清宮文件。(三)立即設法收購湘鄉

曾氏家藏李秀成供狀原件——不幸其後因時局關係，此一計劃又未實現。

應該指出的是：正當羅氏在粵東江南倡導此種計劃時，蔣廷黻氏亦已自美國國任教天津南開大學，積極指導學生致力這種研究工作。——就現在所得到的資料看來：蔣氏當時一方面固留意國內有關史料的搜求。同時更注重介紹歐美人士對於中國近代史各種問題的新見解與新觀念。例如民國十六年秋蔣氏在陶恩培 (Arnold Toynbee) 著「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 (李顯譯，載於民國十六年十月廿三日天津國聞周報第四卷第四十一期)「前記」中即特別介紹原文價值「能給我們一種新見解與鼓勵」。「以外人能了解中國的問題到這個地步，已經了不得，我們也應該聽聽旁觀者的話」。可以說這就是蔣氏研究中國近代史基本態度的最初反映。從此以後，蔣氏的許多有價值的專題論文，不僅是比對參證中外各方史料，並且是折衷中外各種不同見解而得到的「兼聽則明」的結論，完全跳去我國過去「虛情」史論的舊套。這對於後學是有其啓發與影響的。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劃時期的大事。就中國近代史研究本身說來，更可以說是一新時代的開始。因為從此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的十年間，不僅研究基礎完全奠定，更重要地是為今後開闢了一條繼續前進的大道。

所謂「基礎」與「大道」，詳細具體地說來：可分為下列三項：

(一)史料的收輯與流傳 「歷史學祇是史料學」，原為我國史學界最早的認識，也是近二百年來歐洲史家的新信念。在「恢復民族固有傳統及迎頭趕上歐美」的時代精神及環境下，尋訪、收輯、保存、印行有關近代史料，就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步。在這一方面：北平故宮博物院貢獻是最大的：它首將清宮秘檔分別輯印於「掌故叢編」、「文獻叢編」、「史料旬刊」中，民國十九年又將清廷舊輯「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寫本影印行世，其後又輯印「中日交涉史料」、「中法交涉史料」。從此中國近代史料寶藏公開，世人均得利用這些第一手資料，不僅使坊間譯自日人著述的書籍無顏色，即歐美人士根據其本國官私文件而撰成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籍（如摩爾斯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也因此顯現「只看見一件事情的半邊」。蔣廷黻博士介紹「夷務始末」時說：在此書出版以前全世界印行的各種有關中國近代史書，從此以後都必須重寫——由是以言：這些史料印行的價值可以想見了——但事實上，這十年中所印行的故宮文件，不過是清宮檔卷的千分之一，大部份的文物及檔案圖書，自民國二十二年夏因避日軍侵略南運以來，二十餘年中幾經播遷，迄未曾整理印行。時局安定後，尙有待今後繼續努力。

至於私人家藏史料，如王希隱「清季外交史料」，林文忠「信及錄」等都是在這在十年內由其

後人將之公開印行的。

民國二十年蕭一山氏奉政府特派赴歐洲考察文化教育，將英法各大圖書館中收藏的近代史料全部或大部攝製或鈔錄副本回國，編印成「太平天國叢書」、「太平天國詔諭」、「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及「關於中國的大英政府文書總目」（載外交月報第六卷），是為政府派遣專家赴國外收集近代史料的第一次。同時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購故都古代建築設計世家所謂「樣子雷」後人收藏的圓明園宮殿園苑建築模型圖樣，印行「辦理四庫全書經過檔案」，搜集中美關係及有關資料成立「海約翰（John Hay）紀念室」；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張德堅編纂之「賊情彙纂」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搜購得海內外孤本「英傑歸真」（太平天國文獻）。都足以說明：在這十年中，除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外，國內其他學術機關也頗注意於這一工作。

在公私各方面的努力下，過去一般人——甚至是專門研究人員所難得見的許多第一手史料，現在因攝影刊印流傳而普遍度藏於各公私圖書館或文化機關，祇要你有興趣致力於這一研究工作，資料的吸取，比較三十年前是便利多了。

（二）史料的整理與考訂 「文獻不足徵」是研究古代歷史的最大遺憾。反過來說：史料浩如烟海，所謂汗牛充棟不足以形容其量之多，卻是研究近代史的最大優勢。但如果果不隨時加以分類整理